

五原历史研究

刘忠和 著

内蒙古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资助

山西历史研究

刘忠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西口”历史研究/刘忠和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5
ISBN 978 - 7 - 81115 - 857 - 1

I. ①走… II. ①刘… III. ①人口迁移 - 研究 - 西北地区②西北地区
- 地方史 - 研究 IV. ①K294②C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070 号

“走西口”历史研究

著者	刘忠和
责任编辑	周虹
封面设计	敖全英
出版发行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社址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邮编:010010) 发行部:0471 - 4993154/4990092 编务部:0471 - 4990533
网址	http://www.imupress.com
电子邮箱	imupress@163.com
经 销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1115 - 857 - 1
定 价	36.00 元

序 一

地方小戏二人台《走西口》流行于晋、陕、蒙、冀毗邻地区，是晚清、民国年间原生态艺术的精华，它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强烈的现实主义特点，将历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戏曲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在清朝、民国年间，大批的、一代一代的晋陕人民来到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在这里垦殖、经营、谋生活，由此形成了著名的“走西口”移民潮。“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共同构成了晚清、民国年间的移民文化，具有共同的文化内涵，既是汉民族的移民史、血泪史，也是汉民族的拓荒史、开发史。近十多年来，有关灾荒、移民、社会变迁的历史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形成了研究热潮，其中研究“走西口”移民文化现象的论著、研讨会，数量可观且颇具规模。然而相关研究多停留在“文化”层面上，有待于扩大视角，进一步提高。忠和的专著《“走西口”历史研究》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并认真梳理史料，独辟蹊径，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发掘“走西口”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很有学术眼光。

《“走西口”历史研究》是作者在同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写了《走西口活动产生的原因》一章，并对其他章节进行了修改完善而成的。本书从“走西口”研究的学术回顾，到“西口”具体所指的定位，再到西口地区农垦的进程、走西口的主流群体、走西口活动产生的原因、走西口的历史背景与文化积淀，以及西口地区地名探源等，都给予了专题考述。应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系统的“西口”问题研究论著，向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基本素材，展示了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移民、开发、垦殖等系列图景，

使北方地区发展史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作为一部好的学术论著，本作品在许多方面都有扎实的研究和新的成就。如“西口”的内涵和所指，作者引述了大量本证和反证资料，证明“西口就是归化城”，否定了“西口”的“杀虎口说”、“张家口说”和“西口变迁说”诸种说法，特别是用“口岸”，即对于俄商、旅蒙商的开放商口来解释“口”字，比之偏执于关口、隘口更为贴切，从而提出了何谓“西口”的有力一说。又如作者在考证“走西口”的主体人群和“走西口”活动产生的时间方面，论证翔实，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再如，将山西“丁戊奇荒”与“走西口”联系起来，详细考证了二人台《走西口》这一民间曲艺产生的时期，对曲艺史的研究也做出了贡献。至于对西口地区地名的考述，对“走西口”与“西口地区”社会变迁的关系推证等，也都导源溯流，议论纵横，颇具新意。

作者运用社会学、历史地理学与传统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征引文献达三百多种，计有古籍、方志、档案、社会调查资料等多种，同时还亲身进行社会调查，对西口地区的村名、地名进行统计分类，寻绎社会的历史变迁，从而增加了论述的说服力。凡此种种，足见作者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撰述功底。尚需指出的是，本书风格朴实，语言流畅，布局凝练，结构合理，也是值得称道的优点。

忠和心无旁骛，一心科研，知道他的人都为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忠和还很年轻，已有了丰硕的科研成绩，相信他必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学术道路更加宽阔，新的成果不断问世。我曾忝列刘忠和的博士生导师，看到他的迅速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是为序。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薄音湖
2013年7月

序 二

走西口是清代、民国时代的移民文化现象，历来为志移民史、社会史研究者所重。本书作者借“走西口”这种社会现象，从民间流传曲艺中寻绎历史，研究内蒙古西部乃至山西、陕西等华北地区移民史，立意独特，表明作者已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撰著技能。

本作品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撰成，立论充分，论说有据。六个章节从走西口活动的地理范围、演进过程、产生时间、主体人群等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就“丁戊奇荒”与走西口活动的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增进了前几章的说服力；再通过对西口地区地名的探究，更揭示了“西口就是归化城”这种移民文化现象。本书六章合起来是部大作品，分开来也能独立成文，各据千秋，足见作者在史料运用及谋篇布局上的用心。

作者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我曾为他不畏艰难、勇于求索的精神而感动，并就论文写作、史料运用等问题，与其有过多次交流。今看到作者顺利完成博士学位学业，并拿出这样一部立论与史料运用俱值称道的作品，内心十分高兴。

余亦山西人，走西口是山西人的苦难史、奋斗史，也是蒙古族人民的包容史，蒙汉人民的团结史。愿有更多类似作品反映真实历史，也愿作者在学术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张注洪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现状	1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4
(一)研究对象	4
(二)研究方法	5
三、资料来源	8
(一)档案资料	9
(二)地方史志	9
(三)实地调查资料	11
(四)游记、笔记和政协文史资料	14
(五)外文资料	15
第一章 “西口”就是归化城	17
一、目前有关“西口”界定的几种说法	17
(一)特指说	17
(二)泛指说	18
(三)概指说	19
(四)变迁说	19
二、对各种“西口”界说的分析	20
三、关于“西口”的历史记述	28
四、对“西口”的新理解和新认识	32
五、驳“特指说”的其他三地说	37
六、合理理解“走西口”	42
七、与“西口”有关的几个词汇	46

第二章 西口地区的农垦进程	51
一、察哈尔右翼	52
二、归化城土默特	66
三、伊克昭盟	74
四、乌兰察布盟	83
五、西口地区土地性质的思考	86
第三章 “走西口”活动产生的原因	93
一、“走西口”活动起始时间综述	93
二、俺答汗统治前的土默特部	98
三、隆庆和议前的土默特部农业发展	102
四、明末的土默特部汉人情况	117
五、清朝前期土默特地区的农业状况	134
六、“走西口”活动产生的原因	137
七、“走西口”活动的历史分期	140
(一)自发的走西口——寄民阶段	141
(二)自觉的走西口——住民阶段	141
(三)自在的走西口——居民阶段	142
第四章 “走西口”者的主体	144
一、什么人在“走西口”	144
(一)壤土相连,为晋陕商民“走西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45
(二)多种职业的发展是西口地区的需要	147
二、因何要“走西口”	166
(一)田土相连,距走西口者祖籍地较近	166
(二)为求得商业利益而来	168
(三)因饥荒而来	170
(四)追求肥沃的土地	171
(五)躲避战乱而来	173
三、“走西口”者的雁行与定居	174



(一)清中期对“走西口”者的管理	175
(二)雁行客和定居者	179
(三)“走西口”者的家乡观念	183
第五章 “丁戊奇荒”与《走西口》	197
一、“丁戊奇荒”在山西	198
(一)这次灾荒的经过	198
(二)这次灾荒的成因	210
(三)这次灾荒的救治	215
(四)“丁戊奇荒”的后果	225
二、“丁戊奇荒”在西口地区	229
(一)旱灾在西口地区的表现	230
(二)西口地区这次旱灾的原因	233
(三)“丁戊奇荒”对西口地区的影响	234
三、二人台小戏《走西口》	244
(一)二人台戏剧的产生时间	244
(二)《走西口》小戏的产生时间	246
(三)《走西口》小戏的剧情解读	247
第六章 西口地区地名探源	253
一、以西口地方的居住条件命名	253
二、直接以原籍地名命名	256
三、由清政府命名的村庄	258
四、以商号名作为村名、地名	259
五、以招垦时土地编号命名的村庄	262
六、以土地数量命名的村庄	265
七、以水渠或泉水命名的村庄	267
八、以最早定居者的人名、姓氏命名的村名、地名	268
九、直接来源于蒙古语地名	276
十、来源于蒙汉语复合的村名	279
十一、与明长城有关的村名、地名	283

十二、来源于召庙寺观名的村名、地名.....	284
十三、来源于定居者的职业或经营的种类、出产品的 地名、村名.....	286
十四、以地形、地貌命名的村名、地名	288
十五、以“某某窑”命名的村庄	290
十六、以树木或地表植物、生活的动物命名的村庄.....	293
参考文献.....	297
后 记.....	317

导言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了大量的人口迁移现象,由此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移民社会,“走西口”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几百年来,山西、陕西人民不断迁徙到西口地区(今内蒙古西部地区,民国时的绥远省辖区)谋生、定居,形成了一种民间称之为“走西口”的社会现象,它和“下南洋”“闯关东”等,共同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移民现象。

从晚清以来,随着二人台地方小戏,特别是经典剧目《走西口》的广泛传唱,“走西口”这种移民文化现象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地方小戏二人台《走西口》反映出的流浪、哀怨、思念、爱情和苍凉的美,引领着人们不断把目光投向这片热土。从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学者把“走西口”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展开他们的研究。

一、研究现状

“走西口”是中国近代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移民史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该研究领域,也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但改革开放前,人们多在文艺层面上探讨,把二人台《走西口》看作是艺术加工的作品,因而谈不到对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逐渐有学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反映

广大老百姓生活的社会文化领域,因而“走西口”的研究,作为当时中国移民文化和区域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为一些学者所涉及,如田方、陈一筠的《中国移民史略》,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葛剑雄等的《简明中国移民史》等。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史料,在阐述中国移民文化的同时,也涉及对“走西口”的探讨,为我们认识和看待“走西口”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最初的研究思路。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地方历史和区域经济、文化研究的发展,涉及“走西口”的历史研究逐渐增多起来,甚至一些学者还把该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专题或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其中有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乔志强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袁森坡的《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梁冰的《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刘海源主编的《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色音的《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研究》,闫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王卫东的《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哈斯巴根的《18—20世纪前期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以伊克昭盟准噶尔旗为中心》等,安介生、闫天灵、王卫东、哈斯巴根四位的文章,都是博士学位论文,可见该课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至于单篇相关研究论文就更多了。这一领域有相当一批研究者,除乔志强、牛敬忠、安介生、闫天灵、王卫东、哈斯巴根等外,还有王来刚、张贵、刘春玲、刘建生、行龙等。山西大学的区域经济、区域地理研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与“走西口”研究相关的。陕西师范大学有一支以鄂尔多斯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队伍。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内蒙古自治区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内,也有一些人从事与“走西口”相关的研究。此外在苏州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也有一些以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或整个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西口研究”相对较热,可能与此前该研究的不足、有充分的研究空间有极大关系。2003年8月9日,包头市召开了“西口文化研讨会”,2006年8月9日山西省右玉县召开了“晋商与西口文化研讨会”,同年10月在忻州市的河曲县也召开了“西口文化研究会”,这三次会议把“西口文化研究”逐渐推向前进。前两次“西口文化”研究会议,都把参会学者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分别称作《西口文化研究》和《纵论西口》,可以说是前期研究“走西口”的总结性成果。

但从目前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仍存在严重不足。首要表现就是在对“西口”的界定上,现在学界存在着多种认识,如刘建生认为“西口”是杀虎口,行龙认为是张家口,王来刚等又提出了西口的“变迁说”,马步升更是把“黑界地”标在了杀虎口外,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认识。多种“西口”认识,注定“西口”研究存在混乱;而且有些“西口”研究的论述,多是从推理得出的,存在着猜测和臆断。有的研究只是涉及,并不深入,如行龙的文章。有的是以清代内蒙古的行政区划为对象展开研究,但没有注意到内蒙古东西部在移民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可以说是在两种或多种不同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文化,虽同处内蒙古地方,但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同天灵的《汉族移民和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有的研究虽立足于“西口”地方,但由于对西口各地的划分,是用民国或现在的行政区划,因此不能很好地得出结论,如王卫东的《融会与建构》。牛敬忠是绥远近代社会变迁研究的第一人,他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可以说开创了以国民政府所设、后又被撤销的行省研究先河,是在一个文化圈内进行研究,但他关注的角度相对窄了些,还可继续深入,并且没有从汉人移入的角度多些探讨。哈斯巴根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十八到二十世纪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研究》,他是第一位利用地方蒙古文档案进行研究的学者,从蒙古族的视角,看近代鄂尔多斯的变化,看“走西口”现象,虽然只

研究鄂尔多斯一隅，却也起到了管窥作用。正因为“走西口”研究中，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缺陷，笔者利用自己是“走西口”者后代和从事相关研究多年的优势，在掌握了较充分史料的基础上，不昧学识浅陋，斗胆以《“走西口”历史研究》为题，开展相关研究，希冀能为此研究添一砖之力。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走西口”是移民文化的反映，是清代以来山陕人民特别是山西人移居绥远地区或到绥远地区谋生的代名词。“走西口”历史研究是个相对较大的选题，要研究这一命题，还需弄清楚该选题的研究对象及如何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才能有较好成果。

（一）研究对象

西口地区也就是绥远地区，元明以来，是蒙古人活动的空间。但从明清以来特别是康熙西征噶尔丹后，大批的山西、陕西两省人民踏上了这块土地，或佣耕，或贸迁，或“雁行”，或定居，逐渐使这里由单一的游牧社会，转变为亦农亦牧，最终使归化城土默特和察哈尔右翼、河套平原、鄂尔多斯南部等地方完全变成农业的天下。即使位于阴山之北的后山地区，也有大片土地变为农田。原来是蒙古族放牧为主的牧场，变成了汉人种植的农田；原来是蒙旗体制的口外地区，变成了旗厅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所有这些变化，都是“走西口”者出现后产生的，“走西口”这种社会历史现象、移民潮，给西口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彻底的。牛敬忠、闫天灵、王卫东等多位学者的文章，都是以社会变迁为题，也说明了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因此，本文以西口地区（民国时所设绥远省辖区）为研究的空间地理对象，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



市的全部和乌兰察布市(除商都、化德两县外)、巴彦淖尔市(除磴口县外)、乌海市(除乌达区外)的大部。以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沿边地区前往西口地区定居或谋生的商民,为“走西口”者的主体,对他们在西口地区的生活(贸易、土地的开垦等)、交往等,展开深入探讨;对他们给西口地区带来的变化,不管是地名、生活习俗,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进行细致梳理;对定居者、雁行人甚至是刮野鬼者展开研究,这些人都是“走西口”历史研究的人物对象。明代或逃、或被掠、或主动出塞者,虽是少数,但已为清代“走西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走西口”历史研究的时间上限,是从明代嘉靖年间大批逃到土默川的大同叛兵为始,康熙西征噶尔丹后,拉开了“走西口”的序幕,大批山、陕汉民涌入西口地区谋生,这一现象持续到清末、民国,甚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看到类似记载。如从康熙西征噶尔丹开始算起,“走西口”现象已存在了二百六十多年,这是“走西口”历史研究的时间对象。

(二) 研究方法

“走西口”历史研究属于移民史的范畴,也是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又因为西口地区本身还是蒙古地方,因此它也属于蒙古史的研究范畴,是专门史的一个研究方向。因此要进行这样的历史研究,仅靠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方法显然是不足的。“走西口”历史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研究课题,需要运用更多的方法和手段。归纳起来,本文运用了如下一些方法:

1. 历史文献学方法

这是最传统的做史学论文的方法,只有广泛而细致地收集大量相关的史料,才能更好地透过这些史料背后,看到历史事件的真相,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因而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运用,就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傅斯年先生曾

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就是指搜集历史资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历史上的“走西口”移民活动，在历史文献中也留下了记录，当然有的详细，有的粗略，甚或是一爪半鳞，而西口地方又系蒙地，因而也有用蒙古文、甚至是满文记载的，都需要我们对这些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条分缕析，从中整理出与“走西口”活动和西口社会变迁相关的史料，复原“走西口”移民生活的原貌，描绘出西口地区社会变迁的轨迹。

2. 历史地理学方法

“走西口”首先就有个“西口”所指地方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谈“走西口”历史研究，也就是说“西口”的界定是关键。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运用历史地理学方法，不能用今天的地理知识理解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是会随着气候、特别是人类的活动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在西口地方，原来的草原多是自然状态，蒙古人多利用地表的植物、动物为生，对地下或地表很少破坏。而以农为生的汉人迁来后，其最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就是耕作，因而会对地理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使原来的土墚消失，变为平展的农田。只有复原了原来的地理环境，才能找到“走西口”者生活的片断，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本书第二章《西口地区的农垦进程》、第六章《西口地区地名探源》，可以说集中运用该方法，其他章节也有该方法的运用。谭其骧先生曾说：“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弄清一个新县从哪一个或哪几个老县分出来的，也就大致可以肯定开发该县的动力，即最早来那里开垦的人是从哪里来的”^①。这些话用在西口地区是完全合适的。

3. 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

“走西口”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中国移民文化现象的一个

^① 谭其骧：《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重要方面。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较好的选择。“走西口”者大规模、长时间地在西口地方活动,是近代绥远地区汉人不同于内地省区间人口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走西口”者是移民,一般认为,“移民是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人口”^①。根据这一界定,“雁行人”属于季节工,不属于移民。但对西口地区来说,由于清朝长期实行封禁移民政策,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实际上就成为人口迁移的唯一合法方式。西口地区的“雁行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因此西口地区的“雁行人”中的大部分也应是移民,他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雁行”之后,逐渐沉淀下来,成为真正的移民。

4. 地名学的方法

地名是文化的一种反应,地名中蕴含着大量的移民文化信息。本书第六章《西口地区地名探源》就是运用地名学的方法,对西口地区和“走西口”移民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移民的迁入地、迁出地以及迁移路线都涉及大量的地名,这些地名的点、线、面的确定,虽然主要通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但也离不开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移民还可导致地名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对这些地名发展和变化的考察,又反过来可以用来发现或证实移民的事实”^②。西口地方本系蒙古族游牧之地,汉人迁入后发展农业并建立村落,这些村落的名称大多和“走西口”者的历史活动有关。对村名、地名进行研究,对研究“走西口”者的来源有很大帮助,而大多数“走西口”者的活动,历史文献并没有记载,这种方法对这类人的研究特别适用。

5. 田野调查方法

“走西口”者存在着移动,他们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谋生、定居。有人的流动,就有经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因为人是

^①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② 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